



## [综合]舟山与日本风俗比较

贝逸文

来源:

投稿人:

发布时间: 2007-7-24

阅读次数: 497

舟山与日本一衣带水，文化上颇多渊源关系。在贯穿先秦秦汉的几千年中，舟山分属于“越东南境”<sup>(1)</sup>，史称“外越”<sup>(2)</sup>。

中外学者有不少论著认为日本风俗受到过百越文化的影响<sup>(3)</sup>。而且舟山与日本地域毗邻，航海交通便捷，故两地风尚习俗有更多的通属关系。本文拟就文献著录、民俗调查及考古发现，分“龙蛇信仰”、“鸟灵信仰”、“文身习俗”、“土墩墓葬”、“尚武之风”、“饮食习惯”六个方面，对此作一番比较，略陈管见。

### 一、龙蛇信仰

龙蛇信仰是古代百越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闻一多先生《伏羲考》说：“所谓龙者，只是一种蛇的名字便叫龙。”《说文·虫部》曰：“南蛮（东南越），蛇种。”由此可见，吴越地区龙蛇信仰实质是蛇信仰，其源自越人生活的水环境和赖以生存的稻作经济。

《史记》称越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稻米是越人的主要食物之一。为防稻米鼠害，先民自然把能吞食老鼠的蛇视作部落的保护神。在舟山乡村，至今还存有一种“敬蛇”的习俗。农家屋里若有蛇，一般是不能打死的，他们称之为“家蛇”，可捕鼠，保平安。“家蛇”一旦出现，都要烧纸撒米祈福。有资料表明，这种被称为“家蛇”的黑眉锦蛇，它食兴高时，于短时间内能吞食4—5只老鼠，每条蛇在一年中可灭鼠150只<sup>(4)</sup>。这可能是越人保护蛇类、蛇信仰的客观因素。

越人龙蛇信仰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避免蛟龙之害。越人常在水中，由此盛行断发文身，“以象龙子”的习俗。刘向《说苑·奉使》云：“剪发文身，灿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也。”颜师古《汉书·地理志》注说：“（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

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不少资料，进一步印证了舟山先民崇龙尚蛇的事实。我们认为，定海马岙、金塘等商周遗址群出土的印纹硬陶上的几何纹饰，如云雷纹、S形纹、回纹、波状纹、方格纹等，都“是蛇形和蛇的斑纹的模拟和演变”，其原因是由于陶器主人对蛇图腾的崇拜<sup>(5)</sup>。另有一块采自马岙姑娘坟墩的硬陶片，可能是罐类之属的口沿，上饰浮雕龙纹，其风格与同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上习见的“蟠螭”、“夔龙”迥然相异，可以认为是龙蛇崇拜在器物上的表现，备极舟山海岛特色。

在舟山方志中，记述龙王宫和崇龙风俗在宋元间已出现<sup>(6)</sup>。旧时舟山渔民“穿龙裤”、“著龙花蒲鞋”，将主要生产工具渔船称为“木龙”，这些可能是视自己为“龙子”的早期龙崇拜的遗俗。

龙蛇信仰在日本许多地方流传了相当长的时间，《常陆国风土记》所载的夜刀神蛇灵具有相当大的神威，农夫们对其崇拜祭祀，以求田园丰稔，五谷丰登。在九州尾形氏之三轮山神社中，尾形氏的先祖传说就是由蛇变化而来<sup>(7)</sup>。龙王亦是日本众多海神信仰中的特殊的海神，龙宫、龙神和龙王信仰在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丹后国风土记》、《平家物语》中也有不少记述<sup>(8)</sup>。日本的龙蛇信仰，据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记载，最早不过弥生时代<sup>(9)</sup>。

舟山先民崇尚龙蛇，视为图腾，其后逐渐发展衍化为农业、渔业的保护神。这种现象在日本古代一些地区或多或少地存在过，特别是近现代依然流存的蛇神——农业神崇拜，不能不视为同属农业文化圈的一种共同的文化现象，可能有过一定程度的传播影响关系。

### 二、鸟灵信仰

《越绝书》记有“鸟田”之事，说越人视“百鸟佃于泽”为祥瑞，将鸟看成是上天使降福于人类的神灵。有人认为鸟图腾的起源是由于对“鸟田”的崇拜，认为鸟可以带来丰收，于是鸟灵崇拜与稻作农耕结合了起来。<sup>(10)</sup>晋人张华《博物志》卷九说：“越地深山有鸟，有鸠……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吴越春秋》称“大越鸟语之人”，《史记·越世家》更把越王勾践描述成“长颈鸟喙”。在中原人的目光中，当时吴越之民与鸟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但操鸟语，连国君也有鸟相。

舟山先民对鸟的崇拜，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1976年白泉十字路遗址出土1件鸟形陶盖，强烈地显示了舟山先民崇鸟的事实。晋陆云著《答车茂安书》推介舟山时说：“季冬之月，农收既毕，严霜损而蒹葭委，林鸟祭而罽罗设。”这里的“鸟祭”，当是舟山人鸟灵信仰的最早记述。值得注意的是，舟山过去有一种“潮魂葬”，即是为死而不见尸的亡者招魂的葬俗，仪式中有在帐外竖一根长竹竿，悬吊一只竹篮，篮里罩着一只黑布包头的大雄鸡的做法。我们认为这是民间以鸡代鸟追祀亡灵的一种祭祀形式。

在日本也存在着可资比较的同类习俗，日本南方诸岛有一种“鸟竿”的祭祀器，即在一根木条上端安上一只鸟形饰物，以象征鸟灵祭祀亡灵。日本下关等地的幡祭中的羽幡装饰，也是受这种遗风影响的一个例子<sup>(11)</sup>。日本鸟灵祭祀现象最早出现在弥生时代，在奈良县清风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器残片上，刻划着一个带有羽翼的人物形象。在奈良县坪井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器残片上，明显地刻划了一个身着鸟装的人物，其身份当是祭司，这一鸟饰祭司，可能与鸟灵等祭祀有关<sup>(12)</sup>。

从这些资料来看，舟山与日本的古代居民，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鸟灵崇拜及祭祀现象。这种鸟灵祭祀活动，可能是追祀亡者，也可能是祭祀谷神等自然神灵，然其滥觞，可追溯到遥远的、古老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双鸟朝阳”纹牙雕、鸟首形牙匕和双鸟纹骨匕等文物，以及良渚墓地表现鸟类造型、纹饰的玉器，勿庸置疑是鸟灵信仰的鼻祖。

### 三、文身习俗

断发文身和裸体之俗与中原华夏族所固有的那种“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截然相悖，故越人文身被中原人视为异俗的记载在史籍中屡见不鲜。《论衡·书虚篇》云：“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墨子·公孟篇》云：“越王勾践，剪发文身。”《史记·越世家》说夏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时，“文身断发，披草莱至邑焉”。

所谓“断发”，即“断截其发”而成短发，或者“以椎髻为俗”，可见短发或披或髻，也有一定的发式。这里的“断发”，不过是与中原的蓄发习俗相对而言。过去舟山乡村，妇女均梳髻施簪，髻用纱罩网住，簪有银簪、玉簪、骨簪、木簪。这应该就是《淮南子·齐俗训》中说的“越人椎发”的遗风。1976年，衢山孙家山遗址出土2件玉锥形器，被认为是古代先民用于髻发的遗物。颇有见地。

文身一般多与断发并提。文身的方法，高诱《淮南子》注说：“以箴刺皮为龙纹。”即用针黥刺花纹于皮肤，再以墨或丹青涂之，使之成为永久性的纹饰。文身的目的，如前述是为了祛避水族之危害和包含了龙蛇图腾崇拜的涵义。及明代，亦有类似记载。如明人田艺衡在回忆会稽（今绍兴）的房客孙禄时写道：他们父子兄弟“各于两臂背足刺为花卉葫芦鸟兽之形”，当询问其原因时答云：“业下海为鲜者必须黥体，然后能避蛟龙鲸鲵之害”<sup>(13)</sup>。从现代民族学的材料看，文身还有作为一种成年标志的作用<sup>(14)</sup>。舟山海岛现有一些青年人和年轻渔民喜在手臂或胸背部文身，以显示其强悍和壮实。值得一提的是，舟山民间都有婴儿满月时用五彩丝缠臂；端午节在儿童手臂系五色丝环的习俗。有人认这种“五彩丝系臂”的习俗，正是那“以像龙子”的文身习俗的孑遗<sup>(15)</sup>。

裸体与越地气候、文身习俗和习水生活密切相关。史书称“裸以为饰”，作为饰的应是文身之纹，裸体则是有意将身纹显露出来。越人裸身又习于水，因此作为“吴越之俗”的“男女同川而浴”就不足为奇了。<sup>(16)</sup>在舟山的一些偏远小岛，每到酷暑，一些老妪赤裸上身与族人男女老幼憩于庭院纳凉，这在当地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这种生活习俗也应是古代裸体之俗的遗风。

考古发现和民俗现象证实，断发、椎髻和裸体的习俗在舟山是确实存在的。有时“连在庄重的祭祀活动中都仍然不着衣冠，这反映了古代越人与中原人截然不同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sup>(17)</sup>。

与此类似，在日本古代乃至现代的一些居民中，同样存在着相似的习俗。《后汉书·倭传》记载，弥生时代日本列岛的倭人，“俗背徒跣”。《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也有同样的记载。现代日本的文身居民，大多也生活在德之岛、冲水良部岛、水纳岛等琉球群岛一带的操舟弄水之人，文身部位多在手臂手背等处，纹样有十字纹、米字纹及竖点纹等。其目的是否远承古代越人断发文身“将避水神”、“蛟龙不害”的遗俗，虽然尚无法确认，但是在相同的自然环境下出现的同类习俗，其中的文化传承影响因素是不能排除的。

### 四、土墩墓葬

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在吴越地区盛行一种不挖墓坑，平地起封的“土墩墓”，或称之为“石室墓”。这种葬俗形式与其它地区的先挖坑下葬然后堆土起封的埋葬习俗明显不同，是吴越地区所独有的葬俗。《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有一些涉及土墩墓的记载。如“虞山，巫咸所居，山东西十八里，有数十石室。又有石坛，周回六十丈。又山有仲雍、齐女冢”。阖闾之女滕女“自杀，阖闾痛之，葬于国之西阊门外，凿池积土，文石为椁，题凑之中，金鼎玉杯银樽珠襦之宝以送女”。

定海马岙昭君山沿山脊走向分布有一列大小不一的土墩，计9座。土墩位于稍经平整的山巅，铺以大小不一的石块，上封以高2.5~5.0米的馒头形封土，推测是土墩墓，然其陪葬何物，未经试掘，不得解。同类墓葬在定海烟墩双狮山也有发现。

土墩墓渊源可远溯马家浜、崧泽和良渚文化时期<sup>(18)</sup>。墓葬于高山之巅，这种尚高的作风与古越人的崖墓或悬棺葬有相似之处。其结构不挖墓坑，用略加修琢、大小不一的块石砌筑狭长形墓室，上覆片石，然后就地取材，用泥石平地超封，有可能是模仿高山的洞穴<sup>(19)</sup>。

与此类同，在日本佐贺县吉野里遗址，也发现有濠沟环绕的土墩墓，日人称之为坟丘墓。濠沟深约3米，宽约6米，坟丘外部也以高封土即土墩坟丘为标志，所不同的是这种坟丘很大，内部葬有许多陶棺，陪葬品有铜剑、陶器等，另有一些组合的祭祀遗物，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某种宗教观念。安志敏先生认为，弥生时代初期出现的坟丘墓，到古坟时代甚为发达。这种土墩墓的发现，与东南沿海地区湿润多雨的气候及自然环境有关。

### 五、尚武之风

在中原列国盛行青铜礼器、酒器，青铜冶铸业十分发达之际，吴越两国独以青铜戈、剑著称于世。究其原因，盖与古代越人好勇尚武之风关系殊为密迩。《汉书·地理志》记载“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发易死”。吴越之人，自杀亦盛行用剑自刎。《汉书》中还有“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和“越人之俗，好相攻击”等记载。春秋后期，吴越两国之间互相攻伐数十年，虽两败俱伤而不已，直到一方彻底覆灭方告罢休。这点也可以认为吴越人是“好相攻击”在政治上的表现。<sup>(5)</sup>

舟山几无铜矿。定海石礁出土的1把战国早期青铜剑，系产自吴越内地。商周时期，以石代铜，磨制箭镞、戈是舟山类青铜兵器的一大特色。岱山泥峙，普陀朱家尖和定海马岙曾出土3件石戈，石质坚硬，磨制光洁，相当锐利。可以想见当年使用者手执利刃、厮杀搏击的场面。大衢孙家山遗址曾出土了型制相同的4件石钺，被认为是象征权力和威武的礼器。由此推断，海岛先民尚武之风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地方志也有多处言及舟山岛民互相争斗、厮杀事件的记载。明洪武元年汤和巡历海上，闻兰山、秀山两岛“叶希戴、王子贤等相忿斗”。明初，岛民为争夺顺母塗物产，兰、秀、剑、岱、金塘“五山之民相仇杀”<sup>(20)</sup>。乾隆二十一年撤销定海海关时，乾隆帝亦传谕说：“浙民习俗易畔。”这都是舟山岛民习俗易畔，好勇尚武之风的真实记录。

就古文化分布情况，日本北九州文化圈多为战国与秦代的铜利器文化<sup>(21)</sup>，应是他们好战尚勇的表现。日本九世纪以后形成的武士集团，以及战国时期武家政治的展开，其重要的思想支柱是“武家习气”和“弓矢之道”。“蛮勇”、“悍战”与战败后的“切腹自杀”，这类事件和现象贯穿了整段日本史的一半历程<sup>(22)</sup>。这种尚武好斗心理劣性的形成，是否即是狭隘的宗族主义作梗，另文专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因海岛地域狭小和物产贫乏引发原始野性萌动，导致血腥的争斗，周而复始，未曾间断。

### 六、饮食习惯

旧时舟山人有嗜食“咸下饭”和“留饭娘”的习惯。咸泥螺、咸蟹浆、咸膘肠（俗称“乌贼蛋”），各种咸得惊人的腌鱼是渔村中家家户户常备之食物；腌咸菜、腌萝卜、腌冬瓜、腌茄子等，则是农村里四时变换的当家小菜。城镇居民的咸下饭，也与渔、农村大同小异，并无明显的区别<sup>(23)</sup>。由于渔村生活艰窘，为节约稻米，素有“留饭娘”习

俗，即上一餐的饭（主要指中饭）要留下少许冷饭，在下一餐烧饭时和入生米重煮，以提高出饭率<sup>〔24〕</sup>。

在日本也有类似的饮食习惯。钱理群教授著《周作人传》中有这样一段叙述：“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吃到日本饭菜那么清淡，枯燥，没有油水，常大惊小怪。周作人却不以为苦，倒觉得这别有一种风趣。他说：‘吾乡穷苦，人民努力日吃三餐饭，惟以腌菜、臭豆腐、螺蛳为菜，故不怕咸与臭，并不嗜油如命。吃日本的青菜淡饭，反倒吃的滋滋有味。’周还说：‘（日本）有些东西可以与故乡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国某处的什么。这样一想就很有意思。如味噌汁与干菜汤、金山寺味噌与豆板酱、福神渍与酱咯哒、牛蒡独活与芦笋、盐鲈与鳎鲞，皆相似的食物也。’”那段记载里还提到日本人爱吃冷饭的习俗<sup>〔25〕</sup>。周作人说他家乡绍兴有“不怕咸与臭”，“不嗜油如命”的饮食习惯，与旧时舟山相类同。他在日本吃的“滋滋有味”，说明日本的饮食与绍兴、舟山相仿佛。我们还从上文的记述中，认识到日本的盐鲈类似舟山的鳎鲞，觉察到同为岛屿经济，由于稻米缺失，有“留饭娘”、“吃冷饭”的习惯，看来舟山和日本在饮食习惯上一定也属渊源有自。

以上就民俗文化现象对日本与舟山的风尚习俗进行了比较研究。诚然其形成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舟山影响了日本，客观地说，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文化传播的双向性，但就历史渊源而言，无论如何仍然是舟山早于日本。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先秦秦汉以降，舟山与日本文化交流的事实。风俗上的同宗同源，强烈地显示了舟山先民在上古时期不断向海外拓展，徙居日本沿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 【注 释】

- （1）（20）清《光绪定海厅志》。
- （2）《越绝书》卷八：“勾践移治山北，引属东海内外越。”
- （3）（9）刘茂源、林蔚文：《百越文化对东瀛邻国的影响》，《海外交通史》，2000年第1期。
- （4）劳伯勋：《护蛇灭鼠》，《光明日报》，1984年6月2日。
- （5）陈文华：《几何印纹陶与古越族的蛇图腾崇拜——试论几何印纹陶纹饰的起源》，《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 （6）（8）嵊泗县政协：《舟山海洋龙文化》，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年。
- （7）（11）[日]国分直一：《日本文化的古层》，第一书房1992年。
- （10）林华东：《再论越族的鸟图腾》，《浙江学刊》1984年第1期。
- （12）[日]金关恕：《鸟夷与弥生时代的祭祀》，《稻一及其源流之道》，佐贺，1990年。
- （13）《留青日记摘抄》卷一。
- （14）（17）（18）（19）陈克伦：《吴越风俗考》，《复旦学报》1989年第1期。
- （15）俞爽勋、高琳珍：《端午节来历究竟如何》，《中国文化之谜》，上海文汇出版社1989年。
- （16）《孔子集语下》引《尚书大传》。
- （21）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
- （22）赵建民、刘子苇：《日本通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
- （23）周震康：《舟山人嗜食“咸下饭”》，《浙江民俗大观》，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
- （24）方长生：《吃吊饭与留饭娘》，《浙江民俗大观》，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
- （25）朱锡三：《试论“倭越同源”源自“於越”》，《越文化研究通信》，2001年第9期。

